

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

危险的心灵

战后欧洲思潮中的
卡尔·施米特

JAN-WERNER MÜLLER

〔德〕扬·维尔纳·米勒 著

张 葵 · 邓晓菁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

危险的心灵

战后欧洲思潮中的
卡尔·施米特

JAN-WERNER MÜLLER

[德] 扬-维尔纳·米勒 著

张 葵 邓晓菁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德)米勒著;

张葵,邓晓菁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8

ISBN 7-80225-081-1

I. 危... II. ①米... ②张... ③邓... III. 施米特—人物研究

IV. K835.1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8487 号

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

(德)米勒/著 张葵,邓晓菁/译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林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11.875 字数:303千

版次:2006年8月第一版 200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定价: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米勒的《危险的心灵》是迄今为止就卡尔·施米特在战后欧洲所产生的深入且极具侵蚀性的智识影响所作的最为全面的论述。众所周知，施米特曾颇具蛊惑性地推行一种墨索里尼式的方案以解决德国魏玛时期的自由民主危机，之后又热心地服务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然而米勒展示给读者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施米特如何从其普勒滕贝格住所的“放逐”状态神秘地渗入德国、法国以及伊比利亚—拉丁的学术和政治圈中。凭借跨越多种语言的精心研究、概念上的字斟句酌以及流畅深远的行文，米勒所呈现的施米特思想，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争设定了主题，它不仅涉及欧洲的政治哲学、法理学、国家行政以及外交事务，同时也涵盖了神学、美学和史学领域。感觉业已掌握施米特的理论并领会其广泛延伸的读者们，同样也能够从米勒这部不俗之作中获得进一步的启发抑或警醒。值得一提的是，在近来掀起的反对20世纪中叶欧洲右翼哲学继承者的斗争中，《危险的心灵》亦堪称颇有价值的文献。这些继承者们，作为顾问、权威专家、教授、甚至是政治家，在欧洲和北美正日益主导着公共政策和媒体。

—— 约翰·P. 麦考密克 (John P. McCormick)

· 作者简介 ·

扬-维尔纳·米勒 (Jan-Werner Müller) 德国籍。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另著有《另一个国家：德国的知识分子、统一和民族同一性》(*Another Country: German Intellectuals, Un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2000), 编有《战后欧洲的记忆和权力：过去的现在性研究》(*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2002) 和《1945年以来的德国意识形态：联邦德国文化和政治思想研究》(*German Ideologies since 1945: 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Culture of the Bonn Republic*; 2003)。

· 译者简介 ·

张 葵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法学硕士(LL.M.)，现为德国基尔大学法哲学和宪法方向博士生。

邓晓菁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硕士(LL.M.)，现旅居德国。



责任编辑 刘 刚
特约编辑 施 曦
装帧设计 林 涛

献给

B. B.

1913 – 1999

E. M.

1908 – 2001

已获虽多,但仍未知无数……

(Tho' much is taken, much abides . . .)

——丁尼生(Tennyson),《尤利西斯》

我已厌倦阅读那些人，他们总是站到一列，有着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毋宁说，我更愿意阅读敌人，因为敌人会穿透那些思想的防线。

——以赛亚·伯林

致谢

在我最初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从事施米特研究时,得到了 Mark Philp、John Burrow、Andy Rabinbach、Harold James 与 Patrick Gavigan 的巨大帮助。Andy Rabinbach 还最早就“施米特对于 20 世纪意味着什么”这一批判史的想法给予鼓励;另外一方面, Peter Pulzer 则在许多恰当的时机制止我,尽管常常并不成功。Nevil Johnson 多年来一直激发着我对施米特的研究兴趣,常常在不经意间,让我意识到究竟是哪些事物使得一个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如此不同于一个德国的保守主义者,而 Erika A. Kiss 则向我揭示了政治保守派和哲学保守派之间的区别。而且,秉着“同对手(对手一词比敌人更恰当)交谈”的精神,多年来 Andreas Kalyvas 同我就施米特进行了无数次的交流——然而,由此却再一次证明以赛亚·伯林是正确的。

Sinkwan Cheng、Jerry Cohen、Peter Ghosh、Nevil Johnson、Erika Kiss、Peter A. Kraus、Andreas Kalyvas、Leszek Kolakowski、Elliot Neaman、Theodor Paleologu、Peter Pulzer 以及 Hew Strachan 阅读了在各种阶段的部分手稿,并给予很大的助益,使我免于许多错误。特别应予感谢的是马克·里拉(Mark Lilla)和 Galin Tihanov,两者阅读了草稿的全文,并提出了如何完善的建议。而对于所有不足——首要的是对于这种以问题为基础的系列接受史(reception history),责任仍由我承担。

对于友善的解答有关施米特及其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追随者的疑问,我要感谢 José Maria de Areilza, Daniel Arenas-Vives, Olivier Beaud,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Giovanni Capoccia, Richard Faber, Roberto Farnetti, Evelyn Goodman-Thau, 尤尔根·哈贝马斯, Wilhelm Hennis, Ellen Kennedy, Reinhart Koselleck, Dirk van Laak, Günter Maschke, Heinrich Meier, Theodor Parleologu, Pasquale Pasquino, Gianfranco Poggi, Ulrich K. Preuss, Nicolas Roussellia 和 Nicolaus Sombart. Theodor Parleologu 和 Frieder Günter 还大度地允许我阅读他们各自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分别探讨卫道士和 1945 年后德国公法学者的“西方化”。此外,我还想要对教授 Jürgen Becker 博士致以谢意,蒙他允许我得以进入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北威州首府档案馆参阅施米特的私人资料,在那里 Dieter Weber 博士也以极大的友善和效率为我查找资料。还要致谢的是雷蒙·阿隆政治研究中心的 Elisabeth Dutartre,她以非常专业且超出一般职责的耐心,帮助我理清施米特和阿隆之间的通信以及其他存放于阿隆私人档案中的材料。

本书第一篇的部分内容最初发表于《欧洲思想史》(Vol. 23, No. 1[1997]),题为“卡尔·施米特——一个偶然的民族主义者?”。“危险的联系”中的材料早先以“1968 作为事件、背景和意识形态形态”为题发表在《政治意识形态期刊》(Vol. 7, No. 1[2002])中。我得分别感谢该期刊的编者 John Burrow 和 Michael Freeden 允许我使用这个材料。也要感谢 Becker 教授允许我引用施米特未发表的作品,感谢 Dominique Schnapper 允许我引用雷蒙·阿隆的信件,以及 Martin Forsthoff 允许我引用 Ernst Forsthoff 的信件。至于寻找其他材料的版权人事宜,作者都已极尽审慎和周到之义务,而任何未能对之加以引注的缺漏都将在未来的新版中给予纠正。

感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学监和同事,为我提供了如此惬意

的工作环境,特别是为我提供了两个赞助名额以承担与此项目相关的会见和档案研究工作。Humaira Erfan-Ahmed 和 Doris Lehmann 为我整理不断增多的复杂的手稿以及有时甚至更为复杂的信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此致谢。正如每个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所深知的,完成此项研究(*Terminer la recherche*)对于施米特研究者们来说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Adam Freudenheim 以自己的耐心和毅力帮助我来面对这些挑战。

本书献给两位非凡的女性。此外,本书的完成还有赖于另一位女性,Erika Kiss 的帮助,她为我提供了一个家,哲学上的支持以及题目。更重要的是,她以自己的热情和怀疑主义使本书得以全面的构思。

目 录

致谢	1
引言	1
第一篇 一个 20 世纪的德国公法学家	21
第二篇 后半生：反自由主义的功用与滥用	67
面具与镜子	69
寻求稳定性 I：德国宪法学中的施米特主义	87
寻求稳定性 II：工业社会，技术统治与政治意志的消亡 ...	105
全球秩序观：施米特、阿隆以及世界精神的公仆	121
施米特与他的史学家们：历史哲学，全球内战——以及 搁浅之物	146
忧郁的现代主义：里特学派	164
唐·卡洛斯在伊比利亚：“新国家”与旧欧洲的整全	187
背叛地带中的游击队：施米特的游击作战理论 及其游击队	205
危险的迷宫：政治的神学以及自由主义时代的正当性	222

危险的联系：施米特、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限度	240
恐怖活动、紧急状态与自由主义的隐退	258
施米特之死（与奇异的再生）	277
整全的欧洲和欧洲新右派的兴起	294
第三篇 施米特的全球化：划定疆界	313
 跋	 345
译名对照表	354
理性的浪漫派——《危险的心灵》译后记	365

引言

这种间接的、遁形于一切文本之中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迄今为止也是最为真切的。

——卡尔·施米特,致扬格的一封信,1947

总是有人站在河对岸,期待捡拾到装有您信息的漂流瓶——即便他始终默不作声。

——陶伯斯(Jacob Taubes),致卡尔·施米特的一封信,1958

……看不见事物的区别,将事物简单混同,都是弱视的表现。

——尼采,《快乐的科学》

“自由主义”,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1930年时主张,“宣称与它的敌人分享存在”。〔1〕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施米特却挑明,自己决不与自由主义共享这一存在。进而,他试图将自由主义这个所谓“敌对关系中的敌人”的面具揭穿,并摧毁它的根基,为此他付出了自己漫长而成果极丰的知识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然而,他的许多自由主义的对手却不仅打算与其分享存在,而且,他们还致力于吸收这个20世纪最了不起的自

〔1〕 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1930; New York: Norton, 1957), 76.

由主义之敌的知识成果。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所作出的前沿性和总体性的攻击，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知识上的影响。^{〔1〕}由此带来的知识和理论上的碎片，不断地为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知识群体中的政治思想者所捡拾。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尚没有哪个思想家像施米特一样有如此多的来自不同领域的读者群。这个被令人敬畏的左派批评者称为最具知识增量和影响力的国家理论学者的德国人，其思想已经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同盟者——哲学的、政治的，不止于此，还有伦理学的。^{〔2〕}举例来说，就像他在1933年之前，由于提出威权决断而成为自由主义同大众民主决裂的诱饵一样，1945年之后，施米特又变成德国自由主义者们最主要的手。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论述革命的作品中，施米特曾以一个隐匿的对话者身份出现。而他在自己的宪法学说中针对具有颠覆性威胁的革命所提出的紧急状态理论，则被拉丁美洲的法学家们用来为军事政变正名。从魏玛时期开始，他的思想经由列维·施特劳斯(Leo Strauss)、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约阿西姆·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介绍，越过大西洋来到美洲，通过佛朗哥和萨拉查(Salazar)*麾下的法学者们传播至伊比利亚。从施米特那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学到的与1980、1990年代欧洲新右派中扭曲的幻想

〔1〕 Jacob Taubes, *Ad Carl Schmitt: Gegenstrebige Fügung* (Berlin: Merve, 1987), 11. 这里的“自由主义现代性”一词用于表示多重现代性的问题(包括法西斯主义现代性)。从非常宽泛的韦伯式读法来看，自由主义现代性至少表现为科学、理性法和科层制以及自由代议制，最终则是理性化的宗教和伦理，而它们都为正当优先于善好保留余地。在此，我要感谢 Peter Ghosh，他与我就此展开过许多次讨论。

〔2〕 Jürgen Habermas, *Politisch-Philosophische Profile*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71), 64.

* 葡萄牙从1932到1968年期间的独裁领导者。——译者注

家们一样多。1968年的学生运动领导者们——施米特理论的“辩证追随者”〔1〕——满怀激情地从他那里品读着反对自由民主议会制度的精神食粮。而反对学生运动的保守主义者则打算将施米特在1920、1930年代锻造的紧急状态理论付诸行动。受到施米特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则身居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要职。在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裁定通过这一重大时刻,法院的大多数人,至少部分地受到施米特思想的影响,宣称一个民主的欧洲首先需要一个同质的欧洲人民。〔2〕

这个极难捉摸且声名狼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20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和文化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的思想对于如此多的人具有如此重大并且彼此间看上去如此对立的意義,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3〕究竟为什么清除施米特思想这一幽灵是如此之难?1920年2月马克斯·韦伯去世的几周前,在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一次讨论之后,他告诉自己的学生,“判断一个学者正直与否,观察他在与尼采和卡尔·马克思比较时为自己所作的定位,即可略知一二”。类似的情况似乎也可适用于20世纪后期的施米特身上。诸如“施米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

〔1〕 Rüdiger Altmann, “Staatsdenker mit linken Epigonen: Carl Schmitt—Ein fruchtbares Ärgernis”, in: *Deutsche Zeitung*, 6 July 1973.

〔2〕 施米特直接或间接的对话者名单有着相当大的拓展余地。事实上,受海因里希·迈尔极富才华的再现施米特与列维·施特劳斯之间《隐匿的对话》的激励,在他之后形成了一股再现甚至更为隐匿——事实上有时候是完全听不到的——对话的趋势,尤其是在施米特与那些人们对其政治不感冒的思想者之间的对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话的膨胀唯独不利于的人是那些一再试图证明施米特应位居政治思想大师之列,任何20世纪主要的思想家都无法对之忽略的施米特派学者。我在此处的说明乃是受到问题之驱动,而非针对某个人。

〔3〕 Ulrich K. Preuss, “Political Order and Democracy: Carl Schmitt and his Influence”, in: Chantal Mouffe (ed.),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London: Verso, 1999), 155–179; here 155.

么是施米特”这样的设问无数次地出现却始终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1〕究竟为什么他的理论具有极化作用，往往能够激发这样一种观察，即他关于区分敌友乃是政治之本质的主张，无论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少缺陷，但对于接收他自己的作品来说都完全适用？为什么其他思想家，可能除了马克斯·韦伯和马基雅维里，没有如此频繁地被与“恶魔性”扯到一块呢？难道只是因为施米特很容易唤醒魔鬼的力量吗？

经常为人言及的施米特的“知识分子戏剧”对于欧洲思想来说，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他的生命横跨大半个 20 世纪，从 1910 年代初到 1970 年代后期的 70 多年的时间里他几乎不停地写作。在 1920 年代，他是魏玛宪法和反对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的激烈争论中的风云人物。1930 年代初，施米特又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将民主的魏玛宪法共和国转变成一个威权的总统制居功至伟。1933 年他转而投靠纳粹，试图为纳粹统治精心策划出一个制度上的理论框架。尽管他声称反对犹太人，但是到了 1936 年，他却由于天主教信仰以及同犹太学者保持联系遭到纳粹党卫军的攻讦。之后，他又从国内关于国际大空间理论的讨论中退了出来，而这个他所支持的国际法理论曾为希特勒征服东欧的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也正是由于这个理论，暂不论其他，美国人打算把他送上纽伦堡审判台，但是，一系列审讯之后，他们还是放他回家了。

1947 年，施米特从战俘营里释放出来，回到自己的家乡威斯特法伦的普勒腾贝格小镇，然而，那些称他为“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的人们已经拒绝信任他了。他从知识分子那里所失去的宽容

〔1〕 Hasso Hoffman, “Was ist uns Carl Schmitt?”, in: Hans Maier, Ulrich Matz, Kurt Sontheimer and Paul-Ludwig Weinacht, (eds.), *Politik, Philosophie, Praxis: Festschrift für Wilhelm Hennis zum 65. Geburtstag*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8), 544 - 545, and Bernhard Schlink, “Why Schmitt?”, in: *Constellations*, Vol. 2. (1996), 429 - 441.

远比海德格尔更加令人侧目，他被永久禁止在西德教书。然而，他在战后政治思想界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在这种“国内的放逐”期间，他仍旧是一个幕后操纵者(*éminence grise*)，以悖论的方式形式缺席实质在场地参与着联邦德国的公共知识生活，但自始至终都处于争议当中。〔1〕当人们对他的思想或多或少开始秘密地接收之时，施米特随即主动地参与到推动和促进此接收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具有各种形象，但决不会是“一个会动的老古董，绝不是那种一眼即可看穿的来自上古世界的知识废人”。〔2〕事实上，他总是不断地发表评论，从西德日常公共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到冷战后游击队在全球政治中的角色，而且这些评论很快就得到那些想要在联邦德国公共政治生活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青年思想者们热烈的回应和诠释。〔3〕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并不满意从盎格鲁-撒克逊进口的自由民主教义，认为施米特更为深入地洞察到政治的本质。他们接受施米特的观点，认为“胜利者会失去对知识的好奇”——甚至他们中间左翼倾向更重的年轻人也意识到，或许是受挫的右翼在战后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4〕他的许多学生不遗余力地维护着施米特在政治思想中的当代“经典”地位。施米特自己也不断参与到解释自己理念的潮流当中，这一潮流多半是由施米特那种引发震惊的

〔1〕 Carl Ottman, “Carl Schmitt”, in: Karl Graf Ballestrin and Henning Ottmann (ed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ts* (Munich: R. Oldenbourg, 1990), 61–87; here 61.

〔2〕 Gopal Balakrishnan, *The Enemy: An Interlectural Portrait of Carl Schmitt* (London: Verso, 2000), 261.

〔3〕 有关这种多少有些隐秘的接收方面极具价值的文献，参见 Dirk van Laak, *Gespräche in der Sicherheit des Schweigens: Carl Schmitt in der Geistesgeschichte der frühen Bundesrepublik* (Berlin: Akademie, 1993)。

〔4〕 Carl Schmitt, *Glossarium*, ed. Eberhard Freiherr von Mede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1), 117.